

# 清儒孔继汾及其代表作 《阙里文献考》略论\*

王飞朋（四川大学图书馆）



**摘 要：**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汾所撰《阙里文献考》一书，分十五个门类，详细记载了孔氏世系、孔林孔墓、书院户田、历代祀典、释奠礼乐、从祀贤儒、闻达子孙等，内容详赡，分类谨严，考辨精审，纠谬补阙，是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对研究历代衍圣公制度、文庙祭祀典礼变迁、孔府户田庙学沿革、孔氏谱系及家族学术情况等历史和学术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孔继汾 孔府 孔氏家族 阙里文献

《阙里文献考》一百卷，清孔继汾撰。阙里为孔子故里，阙里文献为记载阙里名胜古迹、山川书院、孔林孔庙、历代祭

---

\*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资助项目“《阙里文献考》整理”（编号1650）。

孔典礼、碑传诗赋、孔氏后裔之文献统称。《阙里文献考》一书广泛参考已有的阙里文献，分类谨严，内容详赡，订正史实，纠谬补缺，是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研究阙里文献的基本参考资料。本文拟从作者孔继汾与其学术成就，《阙里文献考》的撰写经过、内容特色、版本情况及研究价值等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这部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sup>①</sup>

## 一、孔继汾生平及学术

孔继汾（1721—1786），字体仪，号止堂，山东曲阜人，清代著名学者，孔子六十九代孙，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四子（继室徐夫人所出），六十九代衍圣公孔继澍之同父异母弟，清初书法家孔继涑之胞兄，著名经学家孔广森之父。<sup>②</sup>孔传铎（1673—1732），字振路，号牖民，恭谨和厚，好读书，工文辞，精通“三礼”，深于乐理，究心理学，著作宏富，有《礼记摘藻》《三礼合纂》《世宗修庙盛典》《读书偶志》《安怀堂文集》等著作十八种。孔继汾幼秉家学，笃志力行，风骨峻洁，年十一失怙，在太夫人徐氏的严格教导下，留心典籍。乾隆三年（1738）春，帝临辟雍讲学，诏衍圣公孔广荣率孔氏子孙陪祀，继汾也随从衍圣公参与观礼。礼毕，召见乾

---

① 周洪才《孔继汾与〈阙里文献考〉》（《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3期）一文对《阙里文献考》的内容及价值已经做了初步的研究。但周氏论文多为论述，对孔继汾的学术成就及《阙里文献考》一书的版本情况、内容特色、研究价值等均缺乏深入考证。

② 关于孔继汾之生平，《孔府文化研究》一书第九章“经术遗篇细斟酌”第五节“孔继汾及其学术成就”对孔继汾之生平和学术情况已经做了简单介绍。见孔祥林、管蕾、房伟著《孔府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437~443页。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结合《阙里文献考·叙考》《清实录》及其他一些资料做进一步的论述。

清宫，赏赐优渥，命继汾肄业国子监。乾隆九年（1744），参与修纂孔氏谱牒。十二年（1747），中乡试。十三年（1748），乾隆幸曲阜，释奠孔子，继汾充当导驾官，为乾隆讲《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章，得到乾隆赏识，蒙恩授内阁中书。是年秋，升中书舍人。十五年（1750）夏，任军机处行走，常扈从乾隆巡行各地。十七年（1752）春，军机大臣奏其“勤慎，材堪造就”<sup>①</sup>，授户部额外主事，夏，转户部广西司主事。十九年（1754）春，扈从乾隆至热河。是年夏，刑部尚书刘统勋赴肃州筹饷，奏随幕府，受任“简书、军檄、旁午、编录之事”<sup>②</sup>。次年（1755）夏，平定达瓦齐叛乱，继汾因军需无缺，回京供职。此后，孔继汾仕途蹇蹇，三遭厄难。

第一次为庇袒庙户及免差碑事件。乾隆因平定达瓦齐之乱，定于二十一年（1756）春幸阙里祭告孔子。孔继汾于是先行请旨东归，修葺林庙，预备接驾事宜。在此期间，地方官员因接驾费用及安排问题与孔府产生龃龉。孔继汾主持上告曲阜、邹县两处地方官，结果得到了革职处分。孔继汾由是免官居乡。此后，吏部奏捐复，报可。但由于之前三次会试均未考中进士，其母徐夫人也年事渐高，且认为其“性多慧忤物，居官非所宜”，孔继汾便以“变化气质，惟在读书”<sup>③</sup>为由，推辞不就。

孔继汾遭受的第二次打击为徐夫人虚坟事件。乾隆三十六年（1771），继汾之母徐夫人念丈夫去世已久，不忍启墓合葬，遂命死后将其葬于启圣墓东偏，于是孔继汾、孔继涑于孔

① 梁章钜、朱智著，何英芳点校：《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54页。

②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家刻本。

③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家刻本。

子父母墓地梁公林外，预先营造了徐夫人墓室。乾隆四十九年（1784）秋，徐夫人卒，孔继汾、孔继涑兄弟因议葬母于孔林侧预先营造之虚坟。然而，此举为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1756—1793）所讼。山东巡抚明兴将此事上奏，乾隆虽没有治罪孔继汾，但要求其立即铲除虚坟，并令缴纳三到四万两白银作为罚金，送往河南抗洪前线。

第三次就是著名的“《孔氏家仪》案”。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孔继汾以其所著《孔氏家仪》为族人孔继戍所讼。孔继戍指斥其书增减《会典》服制，并有“今之显悖于古者”“区区复古之苦心”等字样。山东巡抚明兴奏禀，乾隆震怒，遂将继汾革职，交刑部质讯。孔继汾终被遣戍伊犁，其著作亦被反复查禁。其子孔广森多方营救，获准纳赎以赎，其弟孔继涑也倾力资助，最终在行至安肃（今河北安肃县）时获宥归乡。<sup>①</sup>

孔继汾获释后，不乐居乡，乃南游杭州，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疾作，歿于友人梁同书家，享年六十一岁。<sup>②</sup>是年冬，孔继汾子广森亦因积年忧伤操劳过度以及丧父之痛而歿。父子二人同年去世，实在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损失。

孔继汾身为圣人后裔，幼承庭训，年少时在其母徐氏的严格督导下，刻苦力学，风骨峻洁，学识渊博。民国《山东通

---

<sup>①</sup> 关于《孔氏家仪》一案的详情，可参考以下文章：黄立振《关于〈孔氏家仪〉的禁毁及治罪作者的经过》，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9~292页（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孔子文化大全》之《孔氏家仪》后所附黄立振《〈孔氏家仪〉禁毁及作者罹难经过考》一文与此文大同小异）；陈冬冬《乾隆年间〈孔氏家仪〉文字狱案》，《历史档案》2015年第4期，第128~131页；余梁《〈孔氏家仪〉案始末》，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sup>②</sup>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清代著名书法家，与孔继汾、孔继涑皆友善。其弟梁教书为工部左侍郎。孔继汾长女孔文嫁于梁教书次子梁履绳。参考孔庆余校补《孔氏敦本堂支谱》，同治十二年刻本。

志》卷一百七十二《人物志》云孔继汾“谙悉历朝掌故、庙廷典礼及一切金石图象，前言往行，莫不统会其源流。在京供职，一时名公卿争礼之”<sup>①</sup>，可见孔继汾学殖深厚，得到了时人的尊崇。乾隆二十一年，经过庙户差役及免差碑事件，孔继汾被革职，此后便不理外事，闭门著述。乾隆三十六年之前，相继著有《四书补音》《三礼名物》《历代编年》《刑考》《地志》等书。但由于孔继汾并不将这些抄撮之书看成著作，因此“旋作旋削”<sup>②</sup>，未能流传于后世。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孔继汾著作来看，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礼学和史学方面，对孔府孔庙的仪礼和史实尤为用心，具有强烈的家族学术特色。

孔继汾对礼学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家庭的影响。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精通“三礼”，著有《礼记摘藻》《三礼合纂》等礼学之作。孔传铎晚年一直跟孔继汾生母徐夫人生活，孔继汾幼承庭训，耳濡目染，自然获益良多。稍长，徐夫人又经常命孔继汾随同孔府长者参加孔府祭祀及其他礼仪活动，因此孔继汾很早就谙熟孔府礼仪。自其父孔传铎去世后，孔继汾一直协助衍圣公处理孔府事务，有机会深入接触孔氏礼仪。乾隆二十七年，孔昭焕续娶，咨问仪节于孔继汾，孔继汾之友江衡遂劝其将家庭吉凶诸事撰成仪注，孔继汾始撰《孔氏家仪》一书。

《孔氏家仪》详细论述了孔氏家族庙祭、家祭、丧祭、婚礼、宾礼及修族谱等应遵守的礼节规制。此书撰成后，孔继汾自觉意犹未尽，又撰《家仪答问》一书，对《孔氏家仪》做进一步补充解释，并作《殇服表》《丧服表》两种，以便后人

① 张曜、杨士驥修，孙葆田等纂：《山东通志》卷一百七十二《人物·国朝·兖州府》，民国七年（1918）山东印刷公司排印本。

② 参考孔继汾自撰之《户部主事孔继汾墓志铭》，载李恒法、谢华英编《济宁历代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第291页。



查询丧葬服制。乾隆三十年（1765），孔继汾刻《文庙乐舞全谱》一书，并“督责肄习，孜孜不倦，庙庭祀典为之整肃”<sup>①</sup>。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撰《助仪纠谬集》及《阙里仪注》二书，考录旧仪，删繁正误，企图依据自己对礼的理解，改革或者厘正当时孔府、孔庙不合礼仪的祭祀仪式。对于孔继汾孜孜于改正家仪的原因，江衡在《〈孔氏家仪〉序》中已有明确的揭示：“今止堂之心，方欲率族之人一归于礼，直声正辞，不避嫌讳，上以明圣朝之典，前以传先师之绪，后以息聚讼之纷，其诚也若此。”其族孙孔宪彝在《阙里孔氏诗钞》中云孔继汾“修《家仪》一书，冠、婚、丧、祭罔不具备，迄今子孙遵守之”<sup>②</sup>。该书著于道光年间，可见孔继汾去世后数十年间，孔氏家族依然沿用其制定的家仪。从其所著《孔氏家仪》的影响来看，孔继汾的礼学素养很高，其所革正者也确实切于时用。

孔继汾的史学成就首先表现为对家谱的修订。按照孔府传统，孔氏家谱每逢甲子则大修。乾隆九年，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主持孔氏家族家谱修订工作。但此时孔昭焕年仅十岁，故此此次修谱的实际主持者为孔继汾、孔继涑兄弟。二人为修谱制订了《乾隆甲子年孔氏修谱凡例》《乾隆甲子年孔氏修谱事宜》等纲领性文件。次年，二十二卷《孔子世家谱》成书，孔继汾为该书撰写题跋。此后直至民国十七年，接近两百年的时间，孔氏家族未再大修家谱，可见孔继汾所修家谱的价值之高。孔继汾主编的《孔子世家谱》首次将孔子之前诸圣祖年谱单列成卷，改称年表，并对孔子有关事迹一一考证，撤去荒

① 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徐雁平、张剑编：《清代家集丛刊》第3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② 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徐雁平、张剑编：《清代家集丛刊》第3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诞不经之传说，保留有史可考之事实，“在孔氏修谱史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sup>①</sup>。而孔继汾的另一个史学成就即编纂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阙里文献考》。

## 二、《阙里文献考》撰写缘由及经过

关于《阙里文献考》一书的创作缘由，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卷一百《叙考》中自道：“《阙里文献考》何为而作也？惧阙里文献之鲜征而作也。”阙里即孔子故里，相传春秋时为孔子授徒之所，以城中有二石阙，故名阙里，在今山东省曲阜市。由于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神圣地位，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记载阙里山川风物、孔林圣墓、书院祀田、祭祀典礼、历代褒崇、孔氏后裔等以孔氏家乘为主体的阙里文献。阙里文献虽属孔氏家乘，但由于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孔子之后裔历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赉之恩，代增隆重，因此阙里文献实关系到历朝之重大史实，堪与正史、方志之记载印证发明，互资为用。

汉代已经有《孔子家语》《孔丛子》诸书记载孔子及其弟子或后裔的遗言轶事，可看作阙里文献的滥觞。宋代，孔子四十七代孙孔传撰有《东家杂记》，分类记载有关孔子的杂事旧迹，是阙里文献的发凡起例之作。金代，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增广《东家杂记》为《孔氏祖庭广记》。明代以后，阙里文献类别繁多，出现了《孔子实录》《孔庭纂要》《素王事纪》《圣门志》《孔门金载》等书，然或佚而不传，或杂而不精，或孔氏家有藏本而未经钤刻，在社会上流传不广。明弘治年间，陈镐始裒集旧闻，著《阙里志》，是为旧志，纲举目张，



<sup>①</sup> 孔祥林、管蕾、房伟：《孔府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443页。

事迹粗备。但旧志考据失精，去取无当，存在不少疏失。其后，旧志又经过两次增辑，但“止缀述恩荫，更杂以簿书之文章，而于前人纰缪繁漏之失举，未有所匡正”<sup>①</sup>。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孔尚任又纂《阙里志》，是为新志。新志一变旧志体例，并颇有增益，但芜杂附会，错误多于旧志，故其书久而不行。因此，当时亟须一部内容翔实、考辨严谨的阙里文献汇编。孔继汾编纂《阙里文献考》一书，契合了孔氏家族的这种学术需求。

孔继汾对阙里文献的关注与其母徐夫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阙里文献考·叙考》云其“少时有志于此”。徐夫人教子严格，在孔继汾为童子时，不仅令其留心典册，还“命随诸长者后出见宾客，习礼法，暇更取家门故事及朝廷所以褒崇先圣、泽苗裔于无穷者，一一亲教之，且曰：‘数典而忘其祖，小子之羞也。’”对此，孔继汾“受而识之，不敢忘”<sup>②</sup>。母亲徐夫人对其圣门后裔身份的强调，使孔继汾从小就有一种保存阙里文献、传承祖先学术的文化自觉，也促使其立志编写一部详赡完备的孔氏家乘以记述家史祖德。

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清朝初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削弱汉人的民族意识，力图集政统、道统于一身，于是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提升孔府、孔庙的待遇。清初皇帝不仅增加衍圣公品秩，赋予孔府更多特权，还多次前往曲阜祭拜孔子，且祭孔次数和规模均远超前代。孔继汾身为孔府大宗，自幼饱读诗书，对统治者这种尊孔重道的做法，自然颇为认同。在《阙里文献考·叙考》中，孔继汾就感慨道：“国家崇奖师儒，

①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家刻本。

②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家刻本。



典礼殷盛，凡所以宏教泽而阐道揆者，莫不展义尽诚，度越前古，乃近世以来鲜有。爰素之士，集其事而笔之书者，一二宗老或能言其大概。而齿发颓落，半就遗忘，更数十年后，行益微忽。后有作者，其孰从而求之？”因此，其作《阙里文献考》也含有记录当代尊孔祭孔盛况之意。此外，孔继汾在乾隆辟雍祭祀典礼中，得到肄业国子监的优待，在乾隆首次亲临曲阜祭祀大典活动中，充任讲书官，导引圣驾，受到乾隆赏识，蒙恩进入仕途，孔继汾对此无任感激：“自念遭际圣明，仰沐恩荫，得以不耕不织，优异于编户，而顽钝暴弃，无以纪国恩、述祖德，用昭示于永永，虽万死不足塞责。”在京城读书期间，孔继汾就开始留意收集文献，为著书做准备。《阙里文献考·叙考》自述云：“所遇残编脱简、金石断烂之文，莫不掇拾摩娑，手自著录。复稽之故家遗老，以证辨所闻，而益恢扩其所未见，杂有所得，记而藏之。”可见其搜罗之勤。

乾隆九年，衍圣公孔昭焕发起编纂孔氏谱牒，孔继汾是主要参与人员之一。按照孔氏家族惯例，修谱毕，即增辑志书。《孔子世家谱》修成之后，孔继汾应侄孔广柞之请，出篋中所藏旧稿，开始编纂《阙里文献考》。乾隆十三年后，孔继汾任官京师，其间，一直未忘记其著书的使命，“时与当世名公卿上下其议论，更得质叩典坟，习熟掌故。公余无事，恒以书簞自随”<sup>①</sup>。后被选入军机处，又擢升户部主事，公务繁忙，始少暇日，编书工作时断时续。乾隆十九年夏，跟随刘统勋筹餉肃州，著书工作遂告中辍。乾隆二十一年后，受庙户免差事件的影响，孔继汾“闭户读书，不复与外事”<sup>②</sup>，偶检废簞，见未成旧稿，颇自惜其散漫，遂在《阙里旧志》《阙里新志》及

①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叙考》，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家刻本。

② 李恒法、谢华英编：《济宁历代墓志铭》，齐鲁书社，2011年，第291页。

各家有关撰述的基础上，分别条目，采缀成篇，后又翦芜秽，刊谬误，历时五载，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初成。孔继汾从乾隆十年（1745）修订完家谱后就开始进行《阙里文献考》的编纂工作，至此完成，历时十六年之久，用力颇勤。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准备，《阙里文献考》体例明晰，内容丰赡，考辨精审，质量上乘，堪称阙里文献的集大成者。

### 三、《阙里文献考》版本情况

乾隆二十六年秋，《阙里文献考》一书初成。该书目前所见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二十七年刊本，说明该书于著成后次年便已付梓。道光年间，曲阜孔府所藏《阙里文献考》书版毁于火灾，流传遂少。此后出现了光绪十七年（1891）湘阴李氏刊本。此湘阴李氏是谁呢？吴庆坻《蕉廊脞录》中的一条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线索。《蕉廊脞录》卷八载：

李黼堂中丞桓病中作自挽联句云：“作秀才十年，作外吏十年，作江湖野老三十年，来日无多，于愿已足；刻圣迹百卷，刻自著百卷，刻《耆献类征》七百卷，几生修到，其书满家。”中丞尝刊《阙里文献考》一百卷，刊奏议、书牘、诗文为《宝韦斋类稿》一百卷。<sup>①</sup>

很明显，刻《阙里文献考》的湘阴李氏为李黼堂中丞李桓。李桓（1827—1891），字叔虎，号黼堂，又号辅堂，两江总督李星沅第三子。咸丰五年（1855），以道员拣发江西，署广饶九南兵备道。后历任按察使、督粮道、布政使。同治元年任江西布政使、巡抚，大力办理省城防务，并为镇压太平军筹措粮饷，

<sup>①</sup> 吴庆坻著，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中华书局，1990年，第257页。

政绩颇著，著有《国朝著献类征初编》《宝韦斋类稿》《海粟楼书目》等。

李桓喜读书著述，并热衷刻书。光绪十七年刻本后附有其出嗣子李辅耀所作《〈阙里文献考〉跋》，据《跋》文，李桓致仕后，一意著述，广泛阅读，尝读《阙里文献考》，有感于伪孔末事，作《张温宜从祀文庙说》一文。不知是出于保存阙里文献的心理，还是想推广张温故事，改良社会风俗，李桓动了重刊《阙里文献考》的念头。李辅耀《〈阙里文献考〉跋》云：“右《阙里文献考》百卷，先公用黔阳乐庭杨丈藏本重刊者也。”直接指明李氏刻本是以黔阳乐庭杨丈藏本为底本的重刊本。乐庭杨丈藏本无疑是乾隆二十七年本。

李辅耀《〈阙里文献考〉跋》还记述了李桓刊刻《阙里文献考》的过程：“岁辛卯，始以原书侵木。冬初犹能自校数卷，迨疾作，遂辍业。诂十二月初四，竟弃堂帐，不克见此本之成矣。悲夫！今赖杨丈校勘成书，谨录原文，并识数语于后。”可见《阙里文献考》是李桓在辛卯年（1891）校刻的，书未刻完，李桓便已去世，后由杨丈继续校勘工作。此“黔阳乐庭杨丈”不见其他文献记载，难以查考。笔者据目前一些刻本书目信息推测，此“黔阳乐庭杨丈”或为湖南黔阳人杨基善。

杨基善，字黼沅，号乐庭，笃行博学，清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国子监典簿、禹州知州、候选教谕。父杨积煦，官河南郑州知州。父子二人热衷刻书，曾于道光、光绪年间刻书多种，其家刻本署有“善化杨氏益清堂”之号，为当时有名的刻书家。根据笔者所查各图书馆馆藏目录，黔阳杨氏所刻书至少有以下四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杨积煦等刻，咸丰七年（1857）杨基善补刻之段铎廷撰、黄本骥编订《四书字诂》七十八卷（附检字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藏）；道光二十九年杨积煦等刻，咸丰七年杨基善补刻之段铎廷撰、黄



本骥编订《群经字诂》七十二卷（附检字一卷）（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清光绪十七年（1891）刊杨基善辑《杨氏先媿录存》四卷（首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光绪十八年（1892）刊杨兆李等撰《纪贞诗存》一卷（附不垂杨传奇）（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其中，前两种署“黔阳杨氏长沙浏阳门寓存版”，后两种署“善化杨氏益清堂刊版”。后两种刊刻时间与《阙里文献考》的刊刻时间相同。因此，从时间和籍贯上看，此杨基善很可能是续刻《阙里文献考》的“黔阳乐庭杨丈”。当然，如果要证实此结论，还需要其他更直接的证据。

光绪刻本为重刊本，经过对比可以发现，其虽经过校勘，但仅个别文字有改动，且有原本不误而重刻本误的情况，因此校勘价值有限。

#### 四、《阙里文献考》内容特色

《阙里文献考》一书皇皇百卷，七十余万言，采择宏富，去芜存精，涵盖了孔子世系、林庙古迹、历代隆仪、释奠礼乐、世爵恩例、孔府属官、诗文碑记、弟子贤儒列传等有关孔氏家族方方面面的内容，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是一部集孔氏家族文献、孔庙文献之大成的著述。孔继汾现存数种著述，也以《阙里文献考》一书的学术价值为最大。《阙里文献考》的内容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类例谨严，体系完整

《阙里文献考》一书共分十五门记述阙里文献，卷一至卷十为《世系考》，其中又分为三类：“首述姓，源溯自出也；继以先圣年谱，尊祖也；遂及宗子系叶，传世家也。”（《阙里文献

考·叙考》，下同）卷十一至卷十三为《林庙考》，其中又分为圣林、孔庙、书院三类：“墓为体魄所藏，庙以岁时妥侑，故次之，启圣林及书院即附焉。”卷十四至卷十七为《祀典考》，分为历代褒崇之典、诣学之典、幸鲁之典、遣告之典四类：“盛德百世必祀，自汉、唐以来，封谥屡更，祭秩载易，而配享亦代有异制，至亲诣辟雍，驻罕圣里，以及衔命祭告，皆宜有纪。”卷十八为《世爵职官考》，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礼考》，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为《乐考》，卷二十六为《户田考》。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为《学校考》：“阙里依庙建学，古称庙学，今为置官师，广登进，超郡邑而拟成均矣。”卷二十九为《城邑山川考》：“山川为灵秀所钟，城洫壮官庙之卫。”卷三十为《宗谱考》：“昌平世胄，聚族而居，谱法不明，昭穆曷辨？”卷三十一为《孔氏著述考》。卷三十二至卷四十一为《艺文考》：“列史艺文，仅录篇目，省郡邑志，或专采文章而不收经籍，兹考兼史志体例而用之。”卷四十二为《圣门弟子考》。卷四十三至卷七十二为《从祀贤儒考》：“先贤先儒，已略见祀典，而出处事迹，则不可弗著。”卷七十三至卷九十九为《子孙著闻者考》：“宗谱一门，仅载世次，及流寓支派，若族有俊异，正足表示后昆，用考家传，列行实而以登仕籍者，及列女附焉。”后又有《叙》一篇叙述作书之意。该书分门别类，提纲挈领，结构明晰，眉目了然。

孔氏家乘之分类并不始于孔继汾。南宋孔传的《东家杂记》就已经开始按照类别记述孔氏文献，该书上卷分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亓官氏、追封谥号、历代崇奉、嗣袭封爵沿改、改衍圣公告、乡官九类，下卷分先圣庙、杏坛、后殿、唐柏、庙中古碑、庙外古迹、齐国公墓、林中古碑八类，共十七类。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一书分类如下：卷一先圣（追崇、圣号、世次），卷二崇奉诏文，卷三崇奉杂事，卷四林



庙亲祠、学庙亲祠（皇太子附），卷五祭祀杂事，卷六族孙、世系别录，卷七泽及子孙，卷八姓谱、先圣诞辰讳日、母颜氏、娶元官氏、先圣小影、给洒扫庙户，卷九乡官、庙中古迹、庙外古迹、庙宅，卷十庙中古碑，卷十一族孙碑铭。两书均把一些小类和大类并列，显得较为散漫随意，系统性不够。明清之际编纂的《阙里志》对此有所改进。《阙里旧志》分为礼乐志、世家志、事迹志、祀典志、宗子世纪、人物志、林庙志、古迹志、恩典志、弟子志、历代诰敕、艺文志十二类，分类较为简明，但仍有不足之憾。《阙里新志》分为圣贤志、陵墓志、祠庙志、古迹志、名胜志、祀典志、封爵志、宗族志、学校志、礼仪志、乐舞志、土田志、户役志、人材志、著述志、风俗志、物产志、典谟志、艺文志、史传志等门，分类虽多，但比较杂芜。而且，这两书在各门类之下所设的小类都比较庞杂，不够精练。

《阙里文献考》沿袭了上述家乘文献分门别类的记述方式，并对各家分类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了新的分类法。其十五门的分类，既全面又严谨，是《阙里文献考》超越之前阙里文献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评价该书“言不越六十万，而二千三百余年之事，灿然大备”<sup>①</sup>。《阙里文献考》与《阙里旧志》《阙里新志》相比，虽规模相当，却能给人详赡之感，主要也是因为该书分类精当，论述详尽。

## （二）文字典核，内容详赡

李中简《嘉树山房集》卷五《曲阜县志序》云：“予观

---

<sup>①</sup> 孔昭焕：《〈阙里文献考〉序》，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汾家刻本。按：《阙里文献考》实有七十二万字左右。

《阙里文献考》一编，孔氏止堂所纂，端表圣迹，最为典核。”<sup>①</sup>孔继汾对《从祀贤儒门》援引史料文字的处理，最能体现《阙里文献考》一书“文字典核”的特点。孔继汾在撰写《从祀贤儒门》时，主要依据历代正史文献，但他并不迷信正史文字，对其中有疑问的地方多有改动，而其改动往往与其他文献暗合。如《阙里文献考》卷四十七《董仲舒传》：“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义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论议考问，《汉书·董仲舒传》作“论义考问”。《阙里文献考》此处作“论议考问”，与《群书治要》所引合。同卷，汉武帝云：“越王句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越有三仁。”越，《汉书·董仲舒传》作“粤”，不合文义，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九《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一文正作“越”字，不知孔继汾在编纂此卷时是否参考过《春秋繁露》一书。此外，书中对史书之明显错误也不惮径改。如卷四十八《郑玄传》载孔融于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文中引商山四皓作比，《后汉书》此处作“南山四皓”，明显有误，《阙里文献考》改为“商山四皓”。又如卷五十八《罗从彦传》云罗从彦“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间谒时将乐溪上，吟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将乐溪，《宋史》原文作“将溪”，或有脱漏，当以孔继汾所改为是。如此之处尚多，不烦胪列。

由于《阙里文献考》一书的编纂经过了长期的准备，作者对史料十分熟悉，除征引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外，还利用圣裔身份广泛参考他人所难以闻见之碑传和孔氏谱牒资料，采择丰富，去芜存精，使得该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比

① 李中简：《嘉树山房集》，嘉庆六年（1801）嘉树山房刻本。

如,《阙里文献考》卷十四《祀典考第三之一》主要记载历代褒崇之典,除了征引正史资料外,还广泛参考《贞观政要》《唐会要》《文献通考》《通典》《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玉海》《宋大诏令集》《诸臣奏议》《咸淳临安志》《元典章》《明史稿》《皇明诏令》《礼部志稿》《续文献通考》《国子监志》《春明梦余录》等政书、类书以及《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阙里旧志》《阙里新志》等家乘文献,从而把散于群书的有关孔子祀典的记载萃于一编,颇便参考。卷三十二至卷四十一为《艺文考》,其中的诗文是孔继汾根据孔府碑刻或当时存在的一些著作收录的,其中一些篇目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具有很高的辑佚价值。

### (三) 考订史实, 薙繁辨误

和之前的阙里文献相比,《阙里文献考》一书最大的优胜之处便是订正讹误,内容精确。作者模仿《史记》“太史公曰”之例,在每卷卷末以“述曰”的形式记述作者自己对本卷内容的评论。这些“述曰”有很大一部分是考辨前代文献之失的。宋代《东家杂记》、金《孔氏祖庭广记》以来的孔氏家乘文献,出于尊祖心理,多杂采纬书中关于孔子诞生时的一些神异传说,孔继汾在卷一《世系考》卷末的“述曰”中云:“夫怪异之说,言不雅驯,儒者所弗道。然先圣殷人也,殷之先玄鸟降祥,列在歌《颂》。麟游草附之事,理或有之。若夫吐玉书,降五老,奏天乐,又感生圣子,言出神人,则愈出而愈怪,荒诞不经,其为后人傅会无疑矣。”因此,《世系考》不收这些有附会之嫌的神奇传说。关于《左传》和《史记》记载的周敬王四十二年鲁哀公谏孔子“哀哉尼父”一事,郑玄认为“尼父者,因其字以为谥也”,因此后世不少著作均认为此为谥孔子之始。而孔继汾对此提出了质疑:“考礼,有谏而谥者,如贞惠文子是也;有



谥而不溢者，如县贲父是也。溢必兼谥，而谥不必溢，故吴草庐曰：‘谥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词，如后世祭文之类，非溢也。’况溢法无尼字，康成之说，恐未足为据。”孔继汾援据吴澄之说，分辨谥和溢的区别，认为鲁哀公此言乃谥而非溢，故不应为孔子溢号之始。又如，《阙里文献考》卷六《世系考第一之六》所附的“述曰”云：

《阙里志》及《家谱》载，三十代渠初袭崇圣侯。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圣侯。后周静帝大象二年，又进爵邹国公。子长孙，后周武帝宣政元年袭封邹国公。按：宣政在大象之前，先封其子，后封其父，断无此理。且宣政年间，尚未有邹国名号，所云“长孙袭邹国公于宣政元年”者误也。再考《北史·齐文宣本纪》：“天保元年六月辛巳，诏改封崇圣侯孔长为恭圣侯。”孔长，《谱》内既无其名，其为长孙之误无疑。是初袭崇圣，改封恭圣，进爵邹国公者，乃三十一代之长孙，而非三十代之渠也。又《阙里志》载，长孙二子，英愬、嗣愬。英愬封奉圣侯，无子，嗣愬袭封。按：长孙既袭爵于北，其子断无再受南封之理。且英愬之封，在陈废帝光大元年，岁次丁亥，后十四年庚子，始为周宣帝大象二年。其父受封，乃在其子既袭爵十数年之后，亦事之所必无者。盖英愬自是江左一派，《志》因命名与嗣愬相同，遂讹为长孙之子，其实非也。况《家谱》及《唐书·宰相世系表》并不言长孙有二子，更为可证。再，《谱》《志》又云：“三十二代嗣愬，初袭邹国公，后改封绍圣侯。”考邹国之封，改于后周大象二年，不逾年而周即亡，其封亦遂绝。至隋炀帝，始求孔子苗裔，封嗣愬为绍圣侯。初封邹国公，《谱》《志》似皆有误。今既有依据，悉从更正，不敢以讹传讹，启后人之惑也。

此卷依据正史文献，考证孔子后裔三十、三十一、三十二

代世系，辨析《家谱》及《阙里志》之失，结论十分精确，让人信服。此外，卷末所附《〈阙里志〉辨讹》一文，考辨《阙里旧志》及《阙里新志》二书之疏失近百条，更能体现作者在考据上的深厚功力。

#### （四）表彰幽潜，砥砺后人

孔氏后人孔宪彝曾称赞《阙里文献考》一书“纪述恩贲，表扬幽潜，足裨家乘”<sup>①</sup>。“纪述恩贲”为历代阙里文献共有之特点，而“表扬幽潜”则为孔继汾撰述《阙里文献考》的一个重要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文中对四十三代衍圣公孔仁玉的记载。孔仁玉生于五代战乱之时，其族人孔末原为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朝廷拨给孔庙的洒扫户孔景之后裔，见孔氏子孙单承，门祚衰弱，遂起歹意，谋害仁玉之父四十二代衍圣公孔光嗣，其母抱其隐匿于外舅张温家，方得免遭厄难。后仁玉长大成人，以曲阜令兼监察御史，后世称其为“中兴祖”。孔继汾不仅在《世系考》中记载了孔仁玉的事迹，还在《艺文考》中收录了明代张敏的《孔氏报本酬恩记》来宣扬张氏对于孔氏之恩德，突出反映了其对家族伦理道德的重视。<sup>②</sup>

此外，在《子孙著闻者考》中，孔继汾把流衍繁多的孔氏后裔通过归类来表彰其德，如卷九十一记载死节之士，卷九十二记载孝悌之士，卷九十四记载文学之士，卷九十五记载清流之士，卷九十六记载避世之士，所记载的孔氏后裔有很大一部

<sup>①</sup> 孔宪彝：《阙里孔氏诗钞》，徐雁平、张剑编：《清代家集丛刊》第3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63页。

<sup>②</sup> “孔末灭孔”之说晚出，早期的孔氏家乘文献如《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以及“文化大革命”时出土的孔仁玉墓志均没有提过此事件，深具史才的孔继汾对此不会不加怀疑。无论孔继汾是有意记载此事还是未加详考而误收，均反映其对此事件极具兴趣，也可看出其对家族知恩图报等伦理道德观念之重视。

分是不见于正史的，所以孔继汾此书足以起到“表扬幽潜”的作用。而从其文末的议论中更能看出其对人物的褒贬讥刺，如卷九十一“述曰”云：

汾叙家传才百余人，而于死节之士得二十三焉。呜呼！何其多也。夫士之轻身以趣义者，虽曰所性固然，要亦《诗》《书》《礼》《乐》之教优柔而履饫之，故能见危不避，慷慨捐生。用以激厉颓顽，耀名竹册，世泽之感，盖有本焉。昔陈琳草檄骂曹操，已即为操草檄，德绍文誉不及孔璋，而犬吠非主之对，视俯首乞谢者犹有生气。若太宗容物之量，则又出曹操下矣。

#### 卷九十二“述曰”云：

孝弟为立身大节，古之君子原非以此邀名也，况吾宗仰承圣泽，沐浴于《诗》《书》之教者，既深内行之修，又奚足纪者？虽然，风会浇漓，仁爱道息，类而序之，亦所以丑世厉俗也。其不为传而以孝行著者，尚有五十四代孙思权，六十一代孙弘转、弘实，六十二代孙闾谕，六十四代孙尚隰，六十六代孙兴浩，六十七代孙毓珍、毓颖。列其名，亦使不泯没于后云。

卷九十七记载南朝孔熙先及孔范二人之传，意在警戒后世子孙：

熙先、范才学警敏，文藻博赡，特以不轨于正，遂致身败名裂，为世大戮，良可叹也。独怪二人之行，昭著史册，而家乘中颇多讳辞，岂亲亲之道宜尔邪？然一朝失足，百世莫改，比而书之，亦所以垂炯戒于后世也。

从孔继汾对孔氏后裔的分类及评价就可以看出其编纂《阙里文献考》一书，不仅全面记载了历代孔氏故实，还有着用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劝勉孔氏后人的良苦用心。孔继汾在自撰《墓



志铭》中颇为自得地说：“性耽著述，每考订经义辄有所论，他日子孙贡谏意者其在斯乎？”令人欣慰的是，后人如孔宪彝等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孔继汾《阙里文献考》一书背后的深意。

## 五、《阙里文献考》研究价值举隅

光绪年间，著名学者李桓在《张温宜从祀文庙说》一文中评价《阙里文献考》云：“证据详明，闳深肃括，洵千祀不敝之书也。”<sup>①</sup> 民国《孔子世家谱》称赞《阙里文献考》“继往开来，功冠千古”，且说“（孔继汾）生平著作，以此为最”，对该书的评价极高。《阙里文献考》一书在阙里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确实有着巨大的贡献，从上面对其内容的论述也能看出其超越前人之作的价值所在，这里就不再详论。此节主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阐述《阙里文献考》的研究价值。

### （一）研究孔继汾生平及学术情况的第一手资料

受“《孔氏家仪》案”影响，孔继汾的生平事迹甚少为时人所提及。除了新发现的其所撰《墓志铭》外，《阙里文献考·叙考》也是研究孔继汾生平及学术情况的重要资料。孔继汾精通礼学，尤其是孔庙祭祀礼乐，撰有《孔氏家仪》《阙里仪注》《阙里祭仪录》《文庙礼器图式》等著作，为当时孔府祭祀和其他礼仪活动提供指导。而《阙里文献考》中的《礼考》及《乐考》为其对历史上祭孔礼乐文献的整理，可以和其他著作相互补充，有助于全面了解其学术情况。该书卷末所附的《〈阙里志〉辨讹》，是对《阙里旧志》和《阙里新志》中的错讹的考

<sup>①</sup> 李辅耀：《〈阙里文献考〉跋》，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光绪十七年（1891）湘阴李氏刊本。

辨，从中更能看出孔继汾在考证方面的学术水平。因此，通过《阙里文献考》，我们可以对孔继汾的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更全面的考察。

## （二）研究孔府孔庙孔林的基本参考资料

《阙里文献考》是阙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孔继汾在选取资料时，除征引经史子集文献外，还兼及所闻见之碑传，并利用圣裔身份，广泛参考孔氏谱牒及档案资料，采择宏富，去芜存精，使得该书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此外，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每卷卷末以“述曰”的形式，考订史事，雍繁辨误，纠谬补缺，使得该书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阙里文献考》由于内容精审，成为后来著作参考的对象。毕沅《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在著录与孔氏有关的碑刻时，都曾参考《阙里文献考》的记载以辨正碑刻作者。《续通志》卷三百三十六、卷三百三十七为《孔氏后裔传》，其内容多采自《阙里文献考》。王颂蔚《明史考证掇逸》、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在考证史实和著作时也都曾援引《阙里文献考》。因此，《阙里文献考》可以为学界研究历代祀典变迁、祭孔礼乐增损、户田庙学沿革、祭孔与政治之关系等历史和学术问题提供基本的参考文献。



## （三）研究孔氏家族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阙里文献考》卷一至卷十为《世系考》，主要记载孔子先世、孔子生平及历代衍圣公事迹，兼有不少考辨，是研究衍圣公制度的重要参考之作；卷三十一为《子孙著述考》，可资考证孔氏后裔之著作及家族学术；卷七十三至卷九十九为《子孙著闻者考》，记述除衍圣公外孔子后裔之有名者，其中不少是他书

失载的，可补历代正史和方志记载之不足，对研究孔氏家族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三十六《〈文庙通考〉序》云：“往时孔子六十九代孙止堂作《阙里文献考》，最称详赡。”<sup>①</sup>王懿荣《王文敏公遗集》卷三《重疏前请整理孔子祀田并清查地产疏》在梳理了《阙里文献考》中所记载的孔府祀田后，云“孔止堂此书以圣裔说家乘，至为详尽”<sup>②</sup>。二人都对《阙里文献考》评价颇高。此外，王懿荣在奏请整顿衍圣公地产时，所列举的衍圣公田产数据，全部依据《阙里文献考》的记载。

#### （四）对当前文庙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曲阜孔林、孔庙、孔府是孔子文化的重要象征。目前，国学虽然逐渐复兴，但社会上对孔庙、孔府、孔氏家族的认知还远远不够。而且，在儒家的孔庙祭祀体系中，曲阜孔庙居于核心地位，可称作全国孔庙之“祖庭”。全国各府、州、县的各级孔庙祭祀典礼的仪轨、庙学合一的体制等都以阙里孔庙为蓝本。但目前曲阜祭孔活动在祭祀仪式上还不够规范，不能为其他孔庙的祭祀活动提供很好的借鉴。而《阙里文献考》礼乐部分详细记述了历代阙里孔庙释奠仪式的祭祀仪节、舞蹈仪容、乐器乐章、参祭人员等，对当前全国孔庙祭祀制度的改革和规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淮北士民公刊本。

② 王懿荣：《王文敏公遗集》卷三，民国十二年（1923）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